思想 ·文化

姚莹与桐城经世派的兴起

施立业

[**摘要**] 嘉庆年间, 桐城学风开始转型, 兴起了一个以姚莹为主的青年经世派知识群体。本文对这一思想文化史上的区域性现象作了评述, 认为它是清代社会与学风演变的一个标识。

[**关键词**] 嘉庆年间　经世思潮　桐城　姚莹

[**中图分类号**] K249. 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 - 8587 (2004) - 02 - 0027 - 07

Yao Ying and the Rise of the Tongcheng Statecraft School

During the Jiaqing reign the Tongcheng school of learning began to change giving rise to a younger group of statecraft scholars that were led by Yao Ying. This essay evaluates and discusses this regional phenomenon in intellectual and cultural history. The author maintains that the rise of the Tongcheng statecraft school was indicative of the transformation of Qing society and intellectual circles.

清代的桐城人才济济，人文鼎盛，是海内名邦。在嘉庆年间，桐城的学术文化开始逐步转型，即在崇尚理学和古文为主的社会里出现了倡导“经世之学”复兴的思潮。在这一转型过程中，涌现出一批以青年学子为主体的经世派人物。其中，姚莹是一个关键人物，或者说是一个代表性人物。本文拟就嘉庆年间以姚莹为主的桐城经世派的兴起作一评述，权作对 19 世纪中国经世思潮的一种补充研究。不妥之处，尚乞大家指正。

一

姚莹与林则徐同龄，其生平、思想也与林氏相似或相近，同被学术界誉为鸦片战争前后(或近代初期) 开风气之先的经世派人物。然而有关林则徐的经世思想，学术界已做过较系统而全面的研究，而对姚莹的研究却仅局限于“反侵略”、“睁眼看世界” 等个别专题，相比之下，既单薄又狭隘。其实，与同时代的林则徐、龚自珍等人比较，由于诸多因素作用，姚莹的经世思想不仅有自己的特色，而且萌发、形成的时间也更早些。

姚莹在 65 岁时曾总结自己生平有十大幸事，首揭的两件就是：“人生有托，使在荒裔绝域或僻陋之乡，则蠢然没世已耳，翁 (姚莹自称) 生桐城文物之邦，其幸一也。通邑百族编氓，微姓多矣，而生于麻溪姚氏，代有名贤，学问、文章、道义、宦绩，渊源有自，其幸二也。”①在姚莹看来，自己的人生成就与这两大先天因素密切相关，或者说得益于这两大因素。显然，这也是其经世思想萌发的沃野肥壤。

诚如姚莹所言，在明清时期，桐城是“文

[**收稿日期**] 2003 - 11 - 20
[**作者简介**] 施立业 (1958 —) , 男, 安徽省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 合肥 2300530

物之邦”，有人甚至还称之为“天下第一”[2]。这个”文物之邦”显著表征约略有如下数端：注重文教，科名鼎盛，人才蔚兴，世族发达。而且这些还呈现出“良性互动”之态，即文教兴促成科名盛、仕宦多，科名盛、仕宦多促成世族绵延昌大，世族绵延昌大又促成重教兴学传统，人才蔚起，层出不穷。桐城还有一个人文传统，即桐城人热衷于“祖述先贤”。倘若翻检明清以来桐城典籍，就会发现，有关耆旧先德之类传记作品汗牛充栋，大多数桐城作者都乐此不疲。清末桐城学者马其昶就曾“有志乡邦文献”，作成煌煌巨著《桐城耆旧传》，或据师承，或按家世，收录明清以来桐城人物多达900余人，从不同侧面反映了这个“文物之邦”的风貌。需要指出的是，桐城社会轻视工商，专重科名，因而一代代桐城人“祖述先贤”都是一个固定模式：在仕途则颂治绩，不在仕途则称道德践履，才艺云云在其次。他们采用和宣扬的实际上是一种打上科举文化烙印的事功主义价值观，而这又恰恰是桐城各世族保守的不二法宝。所以，在这种人文背景下生活的人们，很容易产生一种“内圣外王”的亢奋精神，走上经世之路。

事实上，在桐城文化中也具有经世致用的传统。方宗诚曾说过，有明三百年，桐城“科第、仕宦、名臣、循吏、忠节、儒林彪炳史志者不可胜书，然是时风气初开，人心醇古，朴茂之士以文名者大都尚经济、矜气节，穷理博物……”[3]迨至明末清初，左光斗、方以智、钱澄之等都曾留心经世之务，善经世致用之学。史称钱澄之“体貌伟然，好饮酒，纵谈经世之略……究极数学，其后兼求义理。其治诗，遵用小序首句，于名物、训诂、山川、地理尤详。”[4]桐城文派鼻祖方苞承其绪论，亦大倡经世致用之学。他说：“古之治道术者，皆以有为于世也。”[5]又说：“古之人教且学也，内以事其身心，而外以备天下国家之用，二者皆人道之实也。”[6]因而，诸如礼、乐、兵、农、河工、救荒等当世之务，他无不探究之。虽然随着时势、学风变化，经世思潮起伏不定，经世之学时兴时衰，但这一思想资源却在桐城始终产生着深广影响。有学者就曾指出，姚莹之“欲合义理、考据、词章，说本姚氏；而究心兵农，则更与方望溪之旨相同。”[7]

麻溪姚氏是桐城三大世族之一，元末有胜三公者随父由浙江余姚至安庆，后迁居桐城麻溪。世以耕读为业，至第五代姚旭始得科名，中明景泰二年（1451）进士，官至云南布政使司右参政。然后又沉寂数代，至明季又以科名昌大，成为世家大族。关于姚氏之兴，流传有《麦饭诗》故事：其第八代祖姚希廉以父、弟早卒，遂弃举业，专治家政，严课子侄，期以科名振兴家业。他为人忠厚，善待亲邻。然而，某年却被本族某秀才以大徭役困之。时值除夕，追呼者又上门，面对半锅尚未煮熟的麦饭，感慨赋诗一首以贻诸子，说：他日子孙中有出息者，一定要厚恤族人。其诗被其后人称之为《麦饭诗》。他死后，有4个儿子同年考取秀才，追念父亲生平，遂各赋诗一首以和父诗。平时督课子弟时，倘有懈怠者，必鞭策之：《麦饭诗》忘掉了吗？其后，姚氏子孙登科第者必相沿上冢致祭并和诗一首。此一传统至姚鼐时才中止。到姚氏第十代，姚之骐、姚之兰先后成进士，仕为名宦。从此，姚氏科名兴盛，“名哲继踵，遂为世家”[8]。据姚莹统计，自明景泰元年（1450）至嘉庆十六年（1811），姚氏“登科者四十四人，成进士者二十”[9]。姚莹撰有《姚氏先德传》六卷，卷一“行义”收录23人；卷二、卷三“仕绩”收27人；卷四“儒术”收5人；卷五“文艺”收14人；卷六“隐逸”收4人。由上述可知：（一）麻溪姚氏是一个具有《麦饭诗》精神传统的家族；（二）这个家族的特征可概括为“读书仕宦、人物称盛”[10]；（三）它为姚莹提供的是以“行义”“仕绩”为主的精神食粮，其价值取向自然是内圣外王，入仕齐家治国平天下。

姚莹家族中对其影响较大的有3人。一是曾祖姚范，他是乾隆壬戌（1742年）进士，官至编修，好“为举世不好之文”，沉潜经史，“得古人不传之意”，“以为文章关乎世运，学术系乎风俗人心”，“故生平为学，考证与义理兼进”，“而践履醇粹一以程朱为宗”[11]。其文集《援鹑堂笔记》后由姚莹编辑刊出。一是族祖姚鼐，他倡导义理、考据、辞章三者不可偏废的思想，被桐城派奉为家法，文集中也时有

关注国计民生的作品。姚莹曾师从过他。一是父亲姚骙，他“好有用之学，史事尤熟。自经史逮百家言有关世用者，手抄数十帙以授莹，曰：‘虚心求之，实力行之。沽名欺世，吾所深恶也。’”[12]后来姚莹将其奉养官署，政教措施时常得其指点。

姚莹出生于1785年。此时满清国运已趋衰落，社会危机四伏，而姚家也处于败落之中。幼年的姚莹就感受到了生活的辛酸困苦。出生当年，桐城大饥，死亡相继于道。姚母“操内政，日一饭一粥，减仆婢，内外惟留四人给役”[13]。7岁时又目睹了大家庭的分崩离析。是年，主持家政的祖父决定分家，由自己这一支承担大家庭的全部债务。仓卒间竟无居处，只得随母借居于伯外祖家。10岁那年，家中更是灾难不断：夏遭水灾，其母子兄弟“浮板以栖，断炊竟日”，秋遭祖父客丧，年终姚莹得痘症几危。

正当灾难岁月，一件亲戚耍无赖事件深深地刺痛了他：“人以立志为先。吾年十二患痘症，时值岁终，索逋者至，太夫人因侄张某有欠金，寅夜徒步往取。某怒，大詈，且谓无是事。太夫人恚而归，泣以告吾。吾大痛，抚床泣曰：‘自兹以往，儿请立志发愤也。’故吾一生必以拯恤乡邻为急。”[14]从这时起，他便“悲愤苦读，朝日曙夜四鼓不休倦，惟伏案而已。”[15]在母亲教导下，他逐步确立了自己的人生价值取向。《励志赋》追忆云：“嗟余生及式微兮，髫十龄而苦饥。严君耿其孤介兮，逝远游而未归。母氏之贤慈兮，勤抚鬻而教之，曰汝祖之始昌兮，在有明之中叶；积累世之清淑兮，志既存乎方策。维达人（按：指姚文然）之大启兮，佐盛代之丕业，慎民命以祥刑兮，常恐一夫有不获。历仁恕其未替兮，享蒸尝以不忒，汝诚嘉德以自好兮，吾何慕乎丰食！跪受辞以书绅兮，殷余心之所营，生既伤夫轗轲兮，乃益怀此忠贞。懼先业及余坠兮，怆耿耿以难申，横览九州之寥阔兮，古浩荡而无垠，寻前修之极轨兮，骋长佩乎吾所遵……发陈编而究古兮，阅寒暑吾犹夜观，苟天命不余弃兮，舍仁义又何干……。”[16]迨至少年时代，他已博览群书，追慕古人，探究为人之道，确立了经世之志：“束发之初，即思慕古。每览名臣贤豪事绩，未尝不欣然跂望，奸回鄙吝，嫉如寇仇。年稍长，则尝覃恩于天人性命之理，出入于诸子百家之书，泛览汉、唐、宋、元、明诸儒先传记之说，博考史汉以来正、通、别、霸史臣载记之详，乃悄然悲宇宙辽阔，懼此身之委于草露也。”[17]上述这一时期，可以说是生于具有《麦饭诗》精神传统家族的姚莹，在类似经历的刺激下，经世思想的萌发阶段。

嘉庆十二年（1807）姚莹中举，次年连捷成进士，归班铨选。十四年（1809）夏应聘入两广总督百龄幕府。直至十九年（1814）冬，姚莹一直在广东过着游幕生活。在广东期间，姚莹开始接触现实社会，参与过百龄招降海盗张保等活动，对广东社会危机和海外夷情也有了感性认识。他自己认为，此段经历对其此后官场生涯意义很大，说：中进士后“时方年少，使竟出仕，其于国事、吏治、民生未之有学，贻误必多；而放归八年，周历世事，然后为吏，且空乏其身，拂乱所为，得以动心忍性，其幸四也。”[18]显然，在他看来，这段经历就等于自己做官上任前的一种培训或实习，他从中收获有二：一是掌握了为官处事的有用的知识和经验；一是贫以砺志，得以更多地历练修养，增强了官场适应力和“免疫力”。

身为幕客，一般来说，平时没有多少事务，因此，在广东期间，又是姚莹一生中精力最充沛、时间最充足地专注学问、研究和思考问题的时期。其经世思想也就是在这时期不断完善、系统化，大体定型的。兹撮其要者言之。

在《与吴岳卿书》中，他第一次提出了“义理、经济、文章、多闻”说。他说：“古之学者不徒读书，日用事物出入周旋之地皆所切究。其读书者，将以正其身心、济其伦品而已。身心之正明其体，伦品之济达其用。总之，要端有四，曰义理也，经济也，文章也，多闻也。四者明贯谓之通儒，其次则择一而执之，可以自立矣。”[19]这里，他继承了姚鼐的义理、考据、辞章三者不可偏废的思想，同时注入了“经济”内容，强调学以济时致用，夺曾国藩倡“经济”之先声。

倡师说，变士习，以道、功衡学。他认为“今夫古礼之不可复也，亦犹江河之不可复返

矣，激而行之，不若顺而导之之利也”[20]。因而需倡立师道，担负起教士之责。他指出，师之为教，应当有明确的价值标准，“道德、功业、气节、文章者，人之规矩也；诗、书、礼、乐、图籍、名法者，则绳墨斧斤之用也”。应当以此诱导士子“优游乎仁义之途，驰驱乎经济之用，卓绝乎峻直之行，博辩乎华实之说”[21]。他认为：“君子立学传于后世者，道也，而不在文；功也，而不在德。道、功，天下之公也；文、德，一人之私也。道足以继先哲，功足以被来兹，若此者已不必传，天下传之。文者，载道以行。舍道以为文，非文也，技耳，技不足传君子。”[22]

怀忧患意识，提倡破格选拔人才。他说：“天下之患，常中于所忽。朝庭晏安，四夷宾服，又且人主聪明，谨守祖法，勤于政事，大臣夙夜恪恭以求无过，甚安也。是时天下即有奇才而无敢倡为高论、轻议时事，智者无所用其谋，勇者无所用其力，举世以为太平矣，而非常之患即伏于其中……登进之法，宜有常格以绝奔兢之门；甄拔之途，必有殊科以收非常之用。”因为“夫有雄材绝智、抱济时之具者，此其人类不能斤斤于言行称誉之间矣”[23]。

释、道与儒相同，均有用于世，应当兼取并用。他说，佛教之有释加牟尼如儒家之有孔子，佛教“劝化痴愚，摧灭魔怪，于是夷狄之人有所悔懼，此其为功于彼甚大，与孔子之救中国一也”[24]。他赞同《汉书·艺文志》观点，认为道家出于史官，“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然后知秉要执本，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25]，是有用于帝王之道的，且在历史上曾发挥过治术作用。他曾比方说，有研习中医药经典不遗余力者，一旦室中人病，自己医治无效，而有卖奇方者路过，试之，一服而愈，“人皆往庆之，此医独大怒，以为非古方，不自己出也。亦可谓迂矣。世之攻二氏（释、道）者，何以异此！”[26]

提出了一套治乱邦的方略。姚莹一生为官有一信条，即治乱邦要“威、恩、信”兼而用之。这一理念在此时已初步形成。在《上座师赵分巡书》中，他就曾针对广东情形，建议“不动声色措置机宜，弭乱于未形，防患于先事。非有忧天下之深心、怀康济之大略者，未易议此也……尤愿结之以信，震之以威，平之以情，持之以法，破庸人之见，求补剂之宜”[27]。提出了信、威、情、法等治术概念。

总之，在广东游幕时期，姚莹的经世思想已经形成。其后虽有丰富、发展，但思维定势如此，因而思想框架没有大的变化。

二

方宗诚在《桐城文录叙》中，对清初至晚清的桐城文风和学风作了概括性的评述，论及姚莹，则云：“虽亲炙惜抱，而亦能自出机杼，洞达世务，长于经济。植之先生（按：方东树）称其义理多创获，其议论多豪宕，其辩证多浩博，而铺陈治术，晓畅民俗，洞极人情……文事虽未精而有实用。”又云：“桐城之文，自植之先生后学者多务为穷理之学，自石甫先生（按：姚莹字石甫）后学者多务为经济之学。”[28]视姚莹为桐城文风学风向“经济”、“实用”演变的关键人物。然而，学风之变，大凡绝非一人之力所能致，必有振臂高呼者，有响应者、景从者，方可形成气候，转移风习。嘉庆年间，姚莹在家乡的交游活动中，逐渐结识、集聚一批志同道合的青年学子，与之同声共鸣，给桐城社会带来一股清新空气。

姚早年在家乡的交友渠道主要有：（一）亲邻，如与同里的吴子山、方履周、姚易卿等即属此类。《吴子山遗诗叙》云：“子山少余一岁，总角时邻居相善。余年十四，同学于价人先生，余已好为诗歌矣，子山初若不解……逾数年，又同游蒙园先生之门，则子山之诗固甚工矣……复有友人方履周、族兄易卿，皆好为诗。虽宗尚不同而论极相善。履周尝取四人之作合钞之，所为《蔗林诗选》者也。”[29]（二）私塾同学，除前述吴子山外，还有张阮林等。《张阮林传》云：“家故世族，又自矜贵，未冠能文，有才气，好作骈丽之体，睥睨同辈。年十九，游从祖蒙园先生之门，见里人姚莹，与语，大惊，悔其所作，尽焚之，曰：世固有不朽之学，此不可羞耶！……由是博极群书，以著作为己任。诗尤雄丽，取法汉魏，而以少陵为宗，沉挚浑劲，一洗昔人肤袭之陋。”[30]（三）考场相逢，如光聪谐、刘开等。光聪谐

《赠姚石甫莹》诗云："姚子倜傥才不羁，卓立天马当风嘶，又如冥鸿入寥廓，俯视众鸟何喧卑。嗟余弱冠困乡邑，穷卧牛衣羞啜泣，童子六七聚为师，朝授支干暮受揖……春山花满春江清，与君握手皖公城，当时意气为君倾。君言与我不殊调，归来蓬荜时相召，高谈雄辩兴腾踔，人生相逢贵年少。天风吹月海上来，酒酣怀抱得好开，雄剑挂壁莫徘徊，丈夫功名会有日，吾属岂许终蒿莱。"[31]与刘开也是在应试时相识。姚永朴《旧闻随笔》云："按察公(按：姚莹）弱冠，贫不能试，从祖惜抱公给赀入场。时童生中唯刘孟涂先生有名，已县试冠其曹矣。郡试命题为《大观亭述古》，公作五言律百韵，太守大惊，曰：'吾知桐城有一刘开，不知又有一刘开也。'遂以为榜首，入郡庠。"[32]（四）世交，如方东树，就与姚莹家为"累世交"[33]，因而虽年长姚莹10余岁，亦得以交友。（五）交游中相识，如吴子方等。姚莹《赠吴子方》云："去岁（嘉庆十一年）在郡中，忽得延清光。对面苦不识，归来徒怏怏。今兹日在柳，闻子适来城。趋晤喜已多，仓卒转莫名。偕兹六七辈，酌酒入山庄……"[34]

迨至嘉庆十一年（1806）前后，姚莹的交际已是"里中豪杰颇多，皆尝与游"[35]。在这种背景下，终于出现了"吾党之盛"的局面："昔者，吾党之盛也，在嘉庆九年以后。维时海帆（李宗传）、雅堂（朱雅）、岳卿（吴云骧）年最长；植之（方东树）、元伯（马瑞辰）、匡叔（左朝第）、竹吾（方秉澄）差次；其年相若而吾兄事之者为六襄（徐璈）、聿原(光聪谐)、子方（吴孙珽）、履周（方遵道）、阮林（张聪咸）、明东（刘开）、易卿（姚全）；弟之者则子山（吴庚）也，后乃得鲁岑（朱道文）、小东（胡方朔）、幼楷（姚幼楷）。此十数人者，皆以文章道义相切劘，吾所为左右采获以取益者也。"[36]"北园者，桐城方竹吾之居也……嘉庆十一、二年间，则有李海帆、朱雅堂、刘孟涂、吴子方、光聿原、朱鲁存，此十数人者，皆以文章道义相取。余时年略少，每与往来，觞咏其中，以为竹林之游无以过也。"[37]刘开作品中亦对此有所称述："昔者，吾党之人才尝盛矣，以吾与栗原、筐菽、石甫诸君之同聚乡里也。游谳之与俱，言论之与共，文章道义之相与磨砺而讲习，是岂不足以极友朋之盛乎！"[38]

这些青年学子性情品格、兴趣爱好各具特点。刘开曾评述说："今之作者，海内竞雄，准之前修，里中称盛。昔石甫撷芳于义圃，阮林奋藻于文河，筐叔笃志于史载，足下腾声于经述，并皆脱迹尘网，抗踪儒林，挥六代之云英，味百家之渊旨，淬锋则练影宵白，汗简而竹节落青，五色分章，八音殊器。"[39]他们经常相约登临龙眠山，或宴饮游乐，或吟诗作赋，或交流学术，辩论问题。有时观点冲突，争得面红耳赤，但不伤友情。据姚莹回忆说："莹在里门时，从诸君游，有见以相质，有作以相示，或然或否，不必尽合，亦未尝强合也。然仆尝语足下云：'吾生平议论与明东合者十之四五，与匡叔、阮林合者十之六七，与足下(光聪谐）合者遂十之八九。'此非仆人之私言也。顾仆好为繁言费说，每众议蜂起，往复论难不休，而足下独默然不发一语，问其故，则曰：'某之意，石甫已道尽矣。'噫！此亦非足下之私言也。"[40]

尽管如此，"吾党"在价值取向上却有着一致性，其精神风貌也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在人生价值取向上，他们以救世济世为己任，跃跃欲有所为。张阮林1804年所作《江上晓寒柬姚三石甫》诗尽情抒发了他们愤世济时的情结，诗中云："上有亿万八千余里之青苍，抢风不让鹗翼张，东穷析木搏扶桑，鹏翮为之徒低昂，我怀对此殊泱泱。朝过城东日色薄，行见朱门与画阁，达官僮仆揽金貂，豪家侍婢着狐貉，炭然凤凤喷兽炉，毬坐蛩蛩垂绣幕。阁中朝朝列肉屏，浑忘江头风割削，江头居人苦叫号，兀坐终日掩黄蒿，八十老翁犹缊袍，十龄稚子已羔毛。天公与人常颠倒，惟我与尔最牢骚。我有裘一领，直与晏婴卅载侔，子今着敝絮，无乃不耻之仲由。我为子困，子为我忧。何时觅得万丈长大裘，都盖天下寒豁与萧丘，寒士共登春台游。吁嗟乎，我辈若获迎春木，可回举世皆温谷，鸿兮何为向南陆！"[41]姚莹与吴子山、方履周、姚易卿四人时常聚会在张氏之依园，"方其月明露净，四宇漻然，携手登台，览城郭而眺山川，慷慨悲歌，俯仰一

世，意气不亦盛哉！夫四人者，皆非有五亩之桑、儋石之储者也。年未及冠，各有菽水之忧，固尝易衣而出，并升斗而食，不绝炊者仅耳。然方以古人相励，意落落不与俗谐，里中多非笑之，以为妄。”[42]方东树“锐然有用世志，凡礼乐兵刑、河漕水利、钱谷关市，大经大法皆尝究心，曰：‘此安民之实用也，道德、义理所以用此权衡也。’”[43]光聪谐更梦想怀抱“真经济”，以身许国，平定天下，功成而退后“但愿圣天子，端拱化无为”，建设一个全新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君必法尧舜，臣必学皋严。官箴不贪墨，民俗不浇漓。为子必孝，为父必慈。朋友必切切，兄弟必怡怡。齿必辨长幼，分必明尊卑。夫子不嗃嗃，家人不嘻嘻。女不荒织纴，男不废耕耔。颁白不提挈，总角不鞢觿。夜晚不闭户，道路不拾遗。富者不太厚，贫者不太亏。衣服却锦绣，器用进瓦瓷。门阙有象魏，讼庭无榜笞。不闻疾病夭札，但见康乐期颐。在顶必黄发，在口必白髭。在兄无死弟，在父无死儿。在夫无鳏旷，在妇无孀嫠。使四海之外、六合之内，咸奉教于仲尼……”[44]其救世蓝图直可与后世《大同书》相呼应！

他们往往德业自期，贤豪自命，激昂凌厉，破因循郁闷之氛围，作挥斥无前之精神。刘开曾评论左朝第、张阮林、姚莹等云：“夫此数人者，各以古人砥砺而不甘于习俗。方其始之相得也，德业自期，贤豪自命，津津然唯恐不及，相规以道义，而勉以力学，盖不徒极燕游之欢、论说之敏矣。”[45]姚莹与吴子方曾盘踞松下讨论宋元明清历代学术，感慨于“自从宋明来，斯文更彫丧。中间数硕人，扶植各有臧。末流更纷裂，同室相矛枪。遂使章句生，翻笑伊洛荒”，竟至发声大哭，誓欲“独力为砥柱，障此百川狂”。豪心盛气，几于千载一时[46]。这一批青年学子，一扫萎靡颓废、貌似儒雅的沉郁习气，展现出一种清新狂放的精神风貌。刘开曾形象地描述过他们各自身上所透出的独特精神风貌：“故吾入重者，俯深谷，纵心孤往，穷岩壑之幽遐，则思栗原焉；走高原，驰旷野，悲歌慷慨，见风沙之骤起，则思石甫焉；过战场，历关塞，指陈九州之险要，激昂论古，则思筐菽焉；登层台，览胜迹，咏歌千载之成败，挥斥无前，则思幼楮焉；涤清流，沐惠风，风云日开霁，鱼鸟闲适，有自得之趣，则思吾子（朱道文）焉。”[47]

这批怀抱经世之志的青年学子，凭借一种凌厉无前的经世精神，开始从不同角度探讨经世致用之学，从事各种经世实践。由于他们的聚集，在嘉庆中期，桐城社会兴起一股经世思潮，形成了一个以姚莹为代表的青年经世派。

三

然而，这个群体在桐城不久便云飞星散。姚莹曾痛述“吾党之衰”的情形：“子山最少，最先亡。后六年，阮林继亡。又八年而君（吴子方）亡。君之始亡，明东（刘开）尝作传，未几，明东亦亡矣。自明东亡而吾党益衰。诸人或困于饥寒，或牵于仕宦，学业往往中废，其卒能有成、可传于后世者，盖不十人焉。”[48]从嘉庆十三年（1808）姚莹中进士后，这批青年学子为生计所迫，先后离开家乡，奔波于各地，未能再度同时聚会乡梓，桐城社会的经世思潮因此也暂时衰落下来。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像桐城这样青年知识群体同声共鸣、形成气候的现象，与此后的道光年间北京出现的宣南诗社具有许多相同特征，而且较之更具有鲜明的经世色彩，因而可把它视作清代社会与学术演变的一个标识。另一方面，这批桐城学子们，或出仕，或游幕，奔向各地，将这种经世思想和经世学风也推介到全国，影响到整个社会，从而在清代中叶学风转变过程中起到了积极作用。因此又可以说，桐城的经世思潮之暂时衰落实则是一种扩展壮大，是溶入到整个中国社会思潮中去了，是更加波澜壮阔的经世思潮的一部分，在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

①姚莹：“十幸斋记”，《东溟文后集》卷九，台湾文海出版公司影印本《中复堂全集》，下同。

②马其昶：《桐城耆旧传》，毛庆蕃“题辞”，黄山书社1990年版。

③方宗诚：“桐城文录叙”，《柏堂集·次编》卷一，光绪刊本（99卷本）。

④马其昶：《桐城耆旧传》卷七，黄山书社 1990 年版，第 227 页。
⑤方苞："循陔堂文集序"，《方望溪遗集》，黄山书社 1990 年版，第 5 页。
⑥方苞："与某书"，《方望溪遗集》，第 55 页。
⑦姚莹：《识小录》，吴孟复"序"，黄山书社 1991 年版。
⑧姚永朴：《旧闻随笔》卷四，黄山书社 1989 年第 202 页；马其昶：《桐城耆旧传》卷一，第 22 页，卷四，第 104—105 页；姚莹：《姚氏先德传》卷一"先葵轩公"。
⑨姚莹："桐城麻溪姚氏登科记"，《东溟文集》卷五。
⑩姚莹：《姚氏先德传》，"叙"。
⑪姚莹：《姚氏先德传》卷四，"先莁坞公"条。
⑫姚莹："先府君行略"，《东溟文集》卷六。
⑬姚浚昌编《年谱》，《中复堂全集》附。
⑭姚莹手稿，见安徽省图书馆收藏《姚莹家族往来书信》，袋装散件，无题目，著录号为 2062217。按：据姚编《年谱》引姚莹早年所作《痛定录》云，患痘在 10 岁时。
⑮姚浚昌编：《年谱》，《中复堂全集》附。
⑯姚莹："励志赋"，《东溟文集》卷六。
⑰姚莹："复汪尚书书"，《东溟外集》卷三。
⑱姚莹："十幸斋记"，《东溟文后集》卷九。
⑲姚莹：《东溟外集》卷二。
⑳姚莹："师说上"，《东溟文集》卷一。
㉑姚莹："师说中"，《东溟文集》卷一。
㉒姚莹："与张阮林论家学书"，《东溟文集》卷三。
㉓姚莹："通论上"，《东溟文集》卷一。
㉔姚莹："藏经书后"，《东溟文集》卷二。
㉕姚莹："道经书后"，《东溟文集》卷二。
㉖姚莹："藏经书后"，《东溟文集》卷二。
㉗姚莹：《东溟文集》卷三。
㉘方宗诚："桐城文录叙"，《柏堂集·次编》卷一。
㉙姚莹：《东溟文集》卷二。
㉚姚莹：《东溟文集》卷六。
㉛光聪谐：《稼墨轩集·诗集二》，道光丁亥镌刊本。
㉜姚永朴："先世遗事·先大父"，《旧闻随笔》卷四，黄山书社 1989 年版。
㉝方东树撰："姚骙墓志铭"，《桐城姚氏碑传录》卷六。
㉞姚莹：《后湘诗集》卷一。
㉟姚莹："复吴子方"，《东溟外集》卷二。
㊱姚莹："吴子方遗诗序"，《东溟文集》卷二。
㊲姚莹："北园谳集诗序"，《东溟外集》卷一。
㊳刘开："赠吴子方序"，《孟涂文集》卷六，民国四年埽叶山房精印本。
㊴刘开："再与光栗原书"，《孟涂骈体文》卷一，民国四年埽叶山房《孟涂文集》精印本。
㊵姚莹："与光律原刑部书"，《东溟文集》卷二。
㊶张阮林：《傅岩诗集》卷一，清嘉庆戊寅刻本。
㊷姚莹："吴子山遗诗叙"，《东溟文集》卷二。
㊸方宗诚："仪卫先生行状"，见于《大意尊闻》卷首。
㊹光聪谐："纪梦"，《稼墨轩集·诗集一》。
㊺刘开："与光栗原庶常书"，《孟涂文集》卷四。
㊻姚莹："赠吴子方"，《后湘诗集》卷一；"复吴子方书"，《东溟外集》卷二。
㊼刘开："再与鲁岑书"、孟涂文集》卷五。
㊽姚莹："吴子方遗文序"，《东溟文集》卷二。